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翁贺凯
编

张君勱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翁贺凯
编

张君勱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张君劢卷/翁贺凯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9706-7

I. ①中… II. ①翁…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张君劢 (1887~1969)-思想评论 IV. ①B25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8319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张君劢卷

翁贺凯 编

Zhang Junma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35.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64 000	定 价	8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张君勱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 （代引言）

……张君勱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重建中国的思想；他是这一百四五十年间思考中国出路问题贡献最大之一人。

——胡秋原

张君勱（Carsun Chang, 1887—196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毕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创制中的关键作用而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在五四后期肇端科玄论战，首倡“新宋学之复活”，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复兴的撰著和宣扬，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 20 世纪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人物，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国社党”）、40 年代“中国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的党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首要发起人，国共之间所谓“中间力量”（“第三种力量”、“第三势力”）的领袖人物。

然而，正如胡秋原先生所指，张君勱毕生最为核心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重建中国的思想”。从五四时期开始，贯穿其一生，张君勱不断地、有意识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提出自己的民族国家建设构想；而从更直观的字面来考察，“立国”、“建国”、“民族建国”（nation-building）这些语词，早至 1906 年的《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直到临终前的《老当益壮之自白》、《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在张君勱之思想文献中不断地重现与回旋，我们确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将“民族建国”视为其有意识的思想建构与追求。在这篇代引言中，我就将以“民族建国”作为主要视角，在整体上勾勒张君勱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

为读者阅读本卷提供一个大概的背景。^①

一、早年（1887—1919）

张君勱，名嘉森，字君勱，又字士林，号立斋，行世之英文名为 Carsun Chang，祖籍江苏宝山，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嘉定一世家望族。其祖父张铭甫曾在四川历任知县十余年，颇有政绩，且博学多才，“尤邃于宋儒义理之学”。其父张祖泽则奉祖命以医道传业，亦为一方名医；张父后来“经商挫败，景况萧然”，全靠张母刘氏筹划有方，能于俭约之中“不失诗礼家风”，张君勱诸兄弟亦得母教尤多。

六岁那年，张君勱入家塾读书，“善读亦善嬉戏”。1897年，十二岁的张君勱奉母命入上海广方言馆求学。在广方言馆，张君勱接受的是半西半中的教育，四天英文，三天国文。四天英文除了学习文法之外，还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和外国历史，上午授课，下午则自修或体操。国文系由当时广方言馆的名师袁希涛（观澜）指导，主要是研读“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学典章制度輿地，做策论，这开启了张君勱对于政治制度的兴趣。此外，张君勱自己还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朱熹的《近思录》。据张君勱后来回忆，他对《近思录》的研读特别用心，每天天不亮便起床高声朗读，而且为示虔诚，阅读前要先净手，并焚香一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君勱早年对于新儒学的兴趣。

1902年，仍在广方言馆学习的张君勱参加了宝山县的考试，成为秀才。第二年春，马良（马相伯）在上海创立之震旦学院招生，张君勱偶然看到《新民丛报》上所刊登的震旦学院招生新闻以及梁启超所写的《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他深受梁启超“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的刺激，设法缴付了高昂的学费，进入震旦学院学习。震旦学院的课程全由马良亲自以拉丁文讲授，张君勱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勉强跟上，至第二个学期，终因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辍学。之后，张君勱转入收费较低的南京高等学校，不及一年，因为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而被

^① 因“代导言”篇幅有限，关于“民族建国”之概念界定与历史背景，详参拙著《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勱民族建国思想评传》（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第一章，本“代导言”亦是在第一章第三节基础之上去除注释修订而成。

校方勒令退学；他本欲出国留学，终因家人反对而作罢；旋赴湖南，先后任教于长沙、澧州及常德等地之中学，教授英文，前后两年。

1906年，张君勱的留学意愿终获家人之允准，并很快得到了宝山县的公费资助，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宝山县的公费原是资助张君勱学理化，但是他却执意要入自己更感兴趣的政经科，所以半年后便被停止了资助。不过，张君勱很快便找到了维持生计的办法——为梁启超所主编的《新民丛报》撰稿。由此，他也结识了自己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并从此成为梁得力的助手和追随者。1907年10月，梁启超筹组“政闻社”并发起宪政运动，张君勱为其中之骨干，并曾一度代表梁回国从事立宪活动。

留日数年亦是张君勱同西方学术正式接触的开始。其时的早稻田大学，正是日本传播现代自由思想的桥头堡。从曾为张君勱授课的老师和张君勱曾经使用、研读的教材、书籍看，他所接触的现代西方政经思想颇为广泛。不过，张君勱留日时期的思想和行动的脉络显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思想。从思想的脉络看，首先，张君勱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摘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者弥尔（John Mill）的代表作《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而成，由译文可见，张君勱对于弥尔思想的理解和把握都颇得要领；其次，据张君勱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对于早稻田大学四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选修浮田和民（Ukita Kazutami）所讲授的政治哲学，教材则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John Locke）的名著《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最后，张君勱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其释义的时候，也明确地将自己宪政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其留日时期所接受的宪政民主思想。而从政治行动的脉络看，张君勱留日时期所从事的立宪改良活动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要旨无疑是相契的。除了英美自由主义之外，由于当时日本学界颇为推崇德国学术，张君勱在留日时期也已经开始倾慕德国的学问：他曾在早稻田大学修习德文三年，研读德国的经济学和宪法，而且萌生了日后到德国留学的想法。

1910年，张君勱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参加清廷学部专为留学生举办的科考，名列优等。1911年参加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所谓“洋翰林”。不过仅仅数月之后，清廷就覆亡了。张君勱回到家乡宝山，出任县议会议长，并发起国民协会和

共和建设讨论会，后与其他社团合并成为民主党，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张君勱名列三十常务员之一。不久，发生了外蒙古“独立”事件，张君勱和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创办《少年中国》，张君勱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因言辞激烈而触怒了袁世凯，人身受到监视和威胁。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3年岁首，张君勱去国，取道俄国赴德留学。

张君勱到德国之后，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具有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的资格，所以只需听讲一年，便可提交论文参加博士考试。不过张君勱在德国的学习看来却无甚心得：他的德文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另外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当时他仍未逃脱清末民初为改良政治和救国而求学问之风气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每一种学派背后的“哲学”背景。另外一个现实的影响是，次年秋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把心系时政的张君勱的注意力全部牵引了进去：他在寝室中挂起战略地图，精研战情；他到欧洲各地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到过比利时战场的前沿；1915年秋，他还远赴英伦实地旁听自己倾慕已久的英国议会的运作——也正是在那里，他听说了袁世凯酝酿复辟的消息，决意回国参与倒袁。

1916年春，张君勱经西伯利亚返国，先抵杭州，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参与浙江脱离袁世凯的运动，不久辞职，转赴上海担任研究系重要文化产业——《时事新报》的总编辑。是年冬，张君勱判断德国必败，力主对德宣战出兵，乃将编务交与好友张东荪，自己则北上，先说服梁启超，再与梁启超一起四处游说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张君勱与中枢政治牵涉颇深：他先是出任段祺瑞任会长的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长，并陪同梁启超穿梭于北洋政要和各国公使之间进行游说；段祺瑞驱除张勋、“再造共和”之后，研究系因襄助有功，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张君勱则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梁启超、张君勱原本希望通过使研究系主导新国会来实现其政治主张和抱负，然而不久就成为了北洋派系内斗的牺牲品：梁启超随段祺瑞下野而去职，1917年年底张君勱也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心灰意冷之下，张君勱大感救国应先治己，立意未来一年学书写《圣教序》，读汉书，习法文，编大学国际法讲义。不过，“治己”看来仍是为了救国，张君勱并未忘怀政治：1918年10月，张君勱从日本考察回国不久，便致函总统徐世昌，提出应对巴黎和会的具体建议。不久，张君勱又在梁启超的力邀之下奔赴上海，一同踏上了赴欧考察巴黎和会的行程。这次历时三年的欧游对

于张君勱的思想和生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民族建国思想的初步成型（1919—1929）

欧游的第一年（1919年），梁启超、张君勱一行人主要在巴黎拜会各国政要，并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冀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姿态收回权利，提升国际地位。不过，《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尤其是中国在山东（青岛）问题上的外交大挫败，却让张君勱非常不平 and 沮丧，再加上他对民元以后腐败恶浊的议会政治的失望和反省，张君勱深感此前将精力专注于国际法和外交政治对于国家人类可谓徒劳无益，他决意转而“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求一种“最基本的方法”，来对“民族之智力、道德与其风俗”加以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君勱遇到了倭伊铿（Rudolf Eucken, 1846—1926）——这位当时以“精神生活哲学”著称，并与主张“生命哲学”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一同被视为其时欧陆非理性主义思潮泰山北斗的著名哲学家。1920年1月1日，梁启超、张君勱一行人赴倭伊铿家中拜访。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张君勱被倭氏的人格魅力和哲学涵养所深深打动，决意师从倭氏。待梁启超等人回国后，张君勱便正式移居耶拿，从倭氏攻读哲学和哲学史；此外他还每年两赴巴黎，听柏格森授课。正是在这一时期，张君勱开始了对康德以来的德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与文化的整体研习。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陆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尤其是其时欧洲思想界所弥漫的对于自身文化的危机意识和倭伊铿对于儒家思想的格外褒扬，使得张君勱亦开始正视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即已深受濡染的儒家思想的价值。可以说，师从倭伊铿学哲学是张君勱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其思想开始成型并逐渐趋于成熟的肇端。此前，张君勱的思想与行动几乎完全围绕着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外交问题而展开，对于文化和哲学问题则甚少措意；而现在，他开始真正进入思想的堂奥，对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潮流与制度也每每能从思想与哲学的深层背景来加以观察和思考——张君勱曾非常感性地将这种巨大的转变称为“去了一政治国，又来了一学问国”。

不过，对于张君勱而言，“学问国”真是“来”了，而“政治国”其实也从未曾“去”。欧游三年，张君勱身处的欧洲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由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肇端的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

的浪潮亦正席卷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成为一种广泛传布的“新潮”。当其时，欧洲政潮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俄、德两国的革命及其后续的政制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的，本质的分歧在于究竟是走激进的暴力革命之路，还是走渐进的议会民主之路。在师从倭伊铿学哲学之前与之后，张君勱都曾在欧洲各地考察，并广泛拜访了其时欧洲各国的政要——特别是魏玛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诸领袖，其中包括他非常倾慕的魏玛宪法之父柏吕斯（Hugo Preuß，1860—1925），一位坚定的宪政民主主义者；张君勱还撰写了大量译介或评论德、俄两国革命的文章，很明显受到了其时魏玛宪政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受其自早稻田大学以来便一直接受的英美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影响，张君勱持一种非常清晰的“左德右俄”立场：在1920年中与张东荪讨论社会主义的通信中，他高度强调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明确表达了主张以“法律手段”、“议会策略”实现社会主义的立场，并对共产革命的破坏性和阶级狭隘性提出批评。

这样，在1921年年末1922年年初离欧返国前后，张君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幅改造和建设中国的蓝图：政治上，在坚持代议制的基础上改良代议制，结合直接民主和“工业民主”（“工务会议”）的元素；社会经济上，实施“社会所有”和社会主义；文化上，在力主引入欧美科学民主以改造中国旧文化的同时，张君勱非常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固有性和自主性、自决性，不赞成全面、简单地移植西方文化。这套构想，很大程度上也在1922年中张君勱为上海“八团体国是会议”而撰写的“国宪草案”及释义性的《国宪议》一书中反映出来，张君勱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知名的宪法专家。

1923年2月，张君勱在清华学校对即将赴美留学的部分学子发表“人生观”演讲，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引发了一场持续年余的“科玄论战”。张君勱在论战中的言论，反对其时中国思想界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的用心固然可嘉，但是矫枉过正，提出了许多从其一生的思想脉络来看均属极为“反常”和偏激的言论：他几乎完全否认了人生观中具有科学所能为力的认知的成分，带有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他对科学知识、民族国家、工商主义等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持一种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更在这种脉络下提出了“新宋学之复活”的主张——这样一种立场在五四末期已经日趋激进化的中国思想界所会遭到的对待是可

想而见的：科学派和由科学派分化而出、日益壮大的唯物史观派联起手来，痛打“玄学鬼”。科玄论战以“玄学派”在声势上的惨败而告终。论战对于张君勱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张君勱仍然继续着自己在科玄论战中的问题意识，为了对抗科学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狂潮，他和张东荪等友人立定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以弘扬唯心论为己任，欲为中国思想界“成一种新分野”。另一方面，张君勱显然也对自己在论战中的偏激言论和思想背景做了迅速的反思和调校：在哲学上，他疏远了倭伊铿、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开始以康德理性主义的心物二元论为宗；在现实的政治和文化构想上，他也很快回到了肯定西方现代性基本内涵的轨道之上，这种倾向最集中反映在1924年的《国内战争六讲》中。

科玄论战之后的数年里（1923—1927），张君勱积极致力于研究系文化事业的推展。1923年9月，在时任江苏省省长韩紫石的支持下，尚在科玄论战战云之中的张君勱由京赴沪，在吴淞创建并执掌“自治学院”（1925年奉北京政府教育部命改名“国立政治大学”），他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力。随着政见一向对立的国民党着手与共产党联合，如火如荼地推进北伐和国民革命，张君勱亦开始明确倾向于研究系“组党”，表明政见，凝聚力量。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由于张君勱拒绝执行国民党要求念“总理遗嘱”的命令，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党部接管。张君勱自是避身沪上，深居简出，专心翻译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Laski, 1893—1950）的巨著《政治典范》（*A Grammar of Politics*）。通过这部巨著的翻译，拉斯基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相剂于平”、求一平衡之道的思想，构成了张君勱20世纪30年代以降政治经济构想的一个基本政治哲学背景；而拉斯基对制约人获享各项基本自由和实现自我之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高度关注，也对张君勱此后的人权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影响。避居沪上期间，张君勱偶然结识了青年党领袖李璜（幼椿），两人均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的“以党治国”、“党外无党”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党化教育制度极为不满，遂于1928年年初秘密创刊《新路》半月刊。在张君勱所撰的《发刊辞》中，他标举十二项政治主张，再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提出了自己建设中国的构想。张君勱和李璜还在《新路》发表了多篇匿名文章，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以“训政”为名行一党专制、迫害自由之实，是为中国知

识分子在国民党南京建政之后反抗专制、争取自由的“第一声”。正因如此,《新路》刚发行了2期,就因“言论反动、主张乖谬、危害党国、破坏革命”而遭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查禁;后来又坚持出版到第10期,终因杂志无法寄出、印刷厂也不敢承印而停刊。1929年端午节前,张君勱更遭暴徒绑架,囚于沪警备司令部旁空屋二十日,乃得释放。张君勱深感人身安全没有保障,遂于当年秋天,携妻带子,远赴德国耶拿讲学。

三、民族建国思想的高峰与成熟 (1929—1949)

约略在张君勱流亡海外的同时,1929年秋,西方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萧条”),这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经济上,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备受质疑,苏联“五年计划”的经济成长举世瞩目,各国都相继实施不同程度的国家计划或统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成为一股强大的世界性潮流。政治上,为了应对空前严峻的危机,欧美各国或在议会民主的体制之外采取非常措施,强化国家(政府)应急之权力与效能;或径直废除代议制,走上了国家全面控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并积极筹划对外扩张与侵略的“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

如同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的巨变一样,在德国的近两年里(1929—1931),张君勱再一次有机会亲身经历了欧洲社会的大动荡,他也非常关注欧美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同应对措施。1931年8月,张君勱应燕京大学黑格尔哲学讲授之聘请,从耶拿起程返国,途中他特地在莫斯科停留了月余,实地考察苏联的“五年计划”。苏联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欧洲经济民生的凋敝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张君勱自此改变了此前全盘否定苏联(俄)的立场,在依旧严词批评布尔什维克专政和思想专制的同时,对其国家计划经济模式开始青睐有加。

1931年9月17日,张君勱返抵北平,不料第二日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数月之间,日本关东军攻陷东三省,并进逼热河及华北诸省,中国自此陷入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之中。正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之下,1932年4月16日,在张君勱、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等人发起下,“国社党”秘密创立于北平,议定先组织“再生社”,以主张悬诸国门,再汇聚意见形成党纲。5月,《再生》(*The*